

# 军备控制的现状与前景

李彬

军备控制在冷战结束前后一度形成高潮，美苏（俄）双边军备控制和全球多边军备控制都进展迅速，成果丰富。在这段时间，建立了一系列的双边军备控制条约，例如：《中程导弹条约》、《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达成了各种多边的军备控制条约，例如：《欧洲常规力量公约》、《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缔结了建立信任和消除危机的条约，例如：《开放天空条约》、《美苏建立降低核风险中心的协议》；组织了一些新的防扩散机制，例如，《导弹技术控制体制》等。在此期间，《核不扩散条约》得到无限期延长。

在 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放供签署之后，军备控制就逐渐进入低潮。在此之后，多边军备控制谈判场所“裁军谈判会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谈判。在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作为一个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的政府机构转变成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下属部门，使得这个机构的发言权大为降低。甚至一些私立大学的军控研究机构也更改名称，例如，斯坦福大学的“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变为“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防与军备控制研究项目”变成了“安全研究项目”。这些迹象预示着军备控制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 1、美国弹道导弹防御对军备控制的冲击

军备控制的逆转趋势首先出现在弹道导弹防御领域。1972 年，美国与前苏联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其核心限制是禁止部署用于保护整个国土的对飞行中的战略导弹进行拦截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为了加强该条约的有效性和耐久性，防止缔约国逐渐积累对战略导弹的防御能力或者以其他方式掩盖这种能力，《反弹道导弹条约》还花了很多篇幅来构筑一个隔离带，防止缔约国越过隔离带，出人意料地破坏条约的核心限制。

《反弹道导弹条约》本身并没有明确定义反战略导弹，因此，当美国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划界问题：如何区分针对战略导弹和针对战区导弹的防御系统。此前美国使用的是称为“Foster 盒子”的触发标准：如果一个拦截系统针对的目标速度超过每秒 2 公里（对应导弹射程为 400 公里），或者拦截高度超过 40 公里，就需要质疑这样的系统是否为反战略导弹系统。对战略导弹，当时双方的共同理解是《第一期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包含的武器系统。其中前苏联的 SS-N-5 型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射程仅为 1400 公里。因此，针对射程超过 1400 公里、或者速度超过 3.8 公里的导弹防御系统应该被看作是反战略的导弹防御系统<sup>1</sup>。但是，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提出的目标是针对射程达到 3500 公里、速度达到每秒 5 公里的导弹，大大突破了双方过去对《反弹道导弹条约》划界问题的理解。为此，美国不断地推动

俄罗斯同意按照美国的上述新标准重新划界，放松《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范围。这种重新划界明显是军备控制的一种倒退。在军备控制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对军备控制条约进行修改和重新定义的先例，但是，所有这些先例都是试图加强军备控制。研究表明，美国要求重新划界，这不仅会破坏《反弹道导弹条约》设置的隔离带，而且会伤害该条约的核心限制<sup>2</sup>。俄罗斯一直抵制美国要求放宽《条约》限制的要求，双方进行了多轮讨价还价，最后于1997年达成了《划界协定》(Demarcation Agreement)。《划界协定》放松了对导弹防御的限制，使得军备控制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倒退。从此，美国开始了更多的努力，以谋求放松军备控制，这使得军备控制逆转逐渐成为现实。

更为严重的是，在划界过程中，美国还引进了一种叫做“证实过的能力”(demonstrated capability)的概念来替代“内在能力”(inherent capability)的概念，也就是说，只要不公开(例如，通过试验)证实一个导弹防御系统具有反战略导弹的能力，那么这个系统就不算作是反战略导弹系统。在以往的军备控制实践中，控制的基准通常是武器的内在能力，而不是其“证实过的能力”。例如，《核不扩散条约》禁止其非核武器成员国获取核武器。在实践中，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违反该条约，不是根据这个国家的某个装置是否拥有“证实了”的核爆炸能力，而是这个国家否非法积累了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材料。另外一个例子是《导弹技术控制体制》。该体制定义的核武器运载能力是导弹的内在的等效的投掷能力，而不是“证实过”的运载能力。为了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把军备控制的基准选择为“证实过的能力”，这对未来的军备控制实践会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为了发展全国导弹防御(National Missile Defense)系统，克林顿政府的策略是推动俄罗斯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允许美国建立一个“有限的”系统。美国的这种要求一直遭到了俄罗斯的抵制。现在，新的布什政府不再保证只建立一个“有限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也不明确定义导弹威胁的地理来源。为此，布什政府不再谋求俄罗斯同意修改该条约，而是代之以考虑退出该条约。一旦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它会产生一个直接的影响。俄罗斯杜马在2004年4月14日批准《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时，明确将这个条约与《反弹道导弹条约》挂钩：如果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俄罗斯将不再遵守《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up>3</sup>。这样会直接导致核裁军出现逆转。

美国发展弹道导弹防御对军备控制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破坏整个军备控制体制的内在稳定性。《第一期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与《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在同一天签署的，这反映了战略进攻性武器与战略防御性武器控制的关联。很多其他的核军备控制条约得以签署，其基础是假定不存在全国性导弹防御。一旦《反弹道导弹条约》被废止，全球军备控制体制的内在稳定性将受到破坏，军备控制的持久性将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第二，心理上的影响。历史上将第一次废弃一个军备控制条约，而且，《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所要求的核裁军进程会受到阻挠。这对世界各国，尤其是无核武器国家对军备控制的信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得今后的军备控制(包括核不扩散)的发展变得更加艰难。第三，军备控制实践。由于美国在发展导弹防御的过程中改变了一些重要的军备控制规范(norm)，例如，用“证实过的能力”代替“内在能力”的

概念，这会降低军备控制条约实施中的有效性。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美国共和党在国会中已经部分地失去了多数地位，布什政府发展全国导弹防御受到的政治和财政制约将增大，发展势头会受阻。

## 2、《核态势评估》带来的冲击

美国目前正在进行新的《核态势评估》(Nuclear Post Review)，预计评估报告在今年 12 月出台。该评估将重点回答美国核武器的作用、需要瞄准的目标计划(targeting plan)、核武库的构成及运行原则等。上一次《核态势评估》完成于 1993 年并于 1994 年得到批准。该评估对美国过去若干年的军备控制政策，例如核裁军的政策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可以预见，今年的《核态势评估》也会影响美国关于核裁军、导弹防御、禁止核试验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据报导，新的《核态势评估》可能会引入如下的内容：大幅度削减战略弹头的数量、降低核武器的戒备状态、大部分战略轰炸机退出核任务、减少对俄罗斯的目标、增加对中国的目标<sup>4</sup>。

像《核态势评估》这样的军事战略或者武器战略评估有一个标准的格式：首先列出美国的战略利益，以及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然后分析回应威胁的手段，并据此提出武器发展的要求以及武器使用的原则。上述格式给人的印象是这种评估是典型的“理智行为模式”。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问题要复杂得多。很多非理性的因素，例如集团利益，政府组织结构也会影响评估的结果<sup>5</sup>，使得《核态势评估》报告成为一个各种利益妥协的结果。为了影响评估结果，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发表各自的研究，宣传自己的观点。

由国家公共政策研究所组织完成的题为《美国核力量和军备控制的理由和必要条件》的报告代表了保守势力的观点。根据其公开版本<sup>6</sup>，一些持保守立场的学者、前政府官员、政府顾问对美国的核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分析和建议。首先，该报告建议，关于核态势的建议应该对技术的、运行的和政治的变量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着重提出应该考虑“运行的”变量。这个建议反映了与核武器相关的利益集团的关切。美国的战略核力量由战略轰炸机、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核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三个部分构成。如果三个部分大体均匀地削减核武器数量，那么，遇到的相关组织机构的抵制会弱一些。可是，如果核武器裁减到数量特别少的时候，每一个部分的效益与费用之比就比较低。因此，继续裁减美国的战略核武器，从单纯的核武库“运行的”观点来看，应该是去掉三个部分中的某一个，例如，不再保留战略轰炸机。这样，既实现了裁减，也保证了总的效率。可是，这样做遇到的相关组织机构的抵制会非常强，使得这种裁减难以真正实现。因此，报告呼吁《核态势评估》考虑上述“运行的”的因素，不要进行太大规模的核裁军。

该报告还认为，未来的环境是难以预测的，美国的政策目标和要求也会相应地急剧变化，核裁军应该为这些变化留下余地。该报告建议的核武器的作用包括：威慑地区大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慑新出现的全球性竞争者发动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和大规模常规的进攻，防止在常规战争中出现灾难性的损失，提供独特的对特殊目标的打击能力（例如地下目标），增强美国在危机中的影响力。这些建议如果得到接受，其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核武器在这里完全被当作普通武器看待，这会使得美国对核武器的使用变得极其轻率。提高对地下目标的远程打击能力是破坏危机稳定性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美国甚至有可能恢复核试验，以检验美国核弹头在穿地过程中的抗超重能力。这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上述报告还认为，“冷战型的军备控制”不符合美国的基本战略要求，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军备控制是基于现在已经不实用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见下一节），而且还限制了美国根据国际环境变化减少或者增加军备的调节能力。报告建议，美国应该走向冷战后的新军备控制框架，包括：美国单方面削减核武器，但保留重新增加或者继续削减的余地；增加核力量与主动防御的相关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美应该与俄罗斯进行相互保证的谈判，放弃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这个报告的基本思想是认为未来环境难以预测，美国的军备控制限制自身的调节能力。这种思想如果被《核态势评估》采纳，未来美国的军备控制政策将会变得非常消极和易变。

另外一个典型的报告是由美国的一些民间军备控制组织联合发表的，题为《走向真正的安全--未来十年的美国核态势》<sup>7</sup>。该报告反映了自由派对美国核战略和军备控制的基本观点。该报告认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核威胁是来自俄罗斯的由于预警错误和指挥控制失灵造成的事故性核发射，美国保留大量精确的核武器和部署全国导弹防御都会增大这种威胁；美国面临的长远的最大危险来自核扩散的可能性，美国对使用核武器的原则持模糊态度，并拒绝彻底禁止核武器的承诺，这对于防止核武器扩散是不利的。报告希望在制订《核战略态势评估》的过程中有更为广泛的讨论。该报告对未来十年美国的核态势提出了以下建议：明确宣布美国核武器的唯一用途是回应其他国家使用核武器；把核武器发射的准备时间由几分钟增加到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把依靠预设的核武器目标计划改为及时制订新的打击目标；单方面把核武器总数削减到 1000 枚核弹头；马上单方面退役所有战术核武器；承诺在多边基础上继续裁减核武器；承诺不恢复核试验并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强调全面禁止核武器符合美国利益；保证不部署全国导弹防御。参与撰写这篇报告的组织在冷战中以及冷战结束后对推动美俄双边和多边军备控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并仍在敦促美国继续进行深度的核裁军。他们的一些建议，例如，核武器只用于回应核武器的使用，与我国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很接近。如果美国能够作出类似的承诺，这对于降低核战争危险、增加国际和平与稳定有很大的意义，国际军备控制也会稳步发展。

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的军方和国防工业经历了军备控制带来的强大压力。现在，他们的代言人必然会设法影响新的《核态势评估》，夸大核武器的作用、抵制军备控制的发展。上述第一篇报告反应的是这方面的思想。上述第二篇报告则根据冷战后核威胁下降的现实，希望巩固和发展核军备控制的成果，以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应该说，第二篇报告更具有理性。但是，由于美国的安全环境比冷战期间有了很大的改善，美国人民的安全感增加，不再那么关注美国

的核政策<sup>8</sup>。这使得美国政府接受非理性的建议和压力的余地增大，在美国继续裁减核武器的同时，将会更多地照顾核武器相关利益集团。因此，前述第一个报告被美国现政府接受的成分会更多一些。预计，本次的《核态势评估》仍会对核武器的使用原则持模糊立场：既不会明确宣布将核武器用于特殊目的，也不会宣布核武器只用于回应核进攻，但会减少总的目标数目，并由此减少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美国对军备控制，尤其是对军备控制条约的一般态度将会更为消极，以便美国从容消化多余的核力量。

### 3、演变中的军控思想

在冷战的高峰期间，人们关注的重点是防止美苏之间爆发核战争；军备控制的主要思路是减小核危险和核恐惧。为此，提出了战略稳定性的概念，具体包括危机稳定性和军备竞赛稳定性。前者描述两个国家在关系处于危机时发动战争的决心；后者描述两个国家武器发展的相互刺激的程度<sup>9</sup>。当时美苏军备控制的重点是使得双方的核武器格局不利于发动核战争以及双方核军备竞赛有所节制。因此，维持和增强战略稳定性成为美苏军备控制的主要思想和理论。最高的战略稳定性是：选择首先发动进攻比选择报复给自己带来的损失更大；增加自己的武器数量会使得对方需要更少的武器。这样的武器格局实际上是不可能出现的，退而求其次的结果是：选择首先发动进攻比选择报复，自己的损失相差不大；增加自己的武器数量会使得对方不需要明显增加武器。对于常规武器，实现这样的结果需要发展防御性的武器和设备，以使得发动进攻效率很低，成本很大。对于核武器，由于现阶段防御性武器的效率比进攻性核武器低得多，不可能通过发展防御性武器来增大战略稳定性。可是，进攻性核武器具有饱和和效应：当使用核武器的数量比较多时，增加这个数量并不会明显增大核武器总的杀伤破坏效果。据此，六十年代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相互确保摧毁”的概念：如果美苏有一定数量的核武器能够在遭受第一次打击中生存下来，并在报复打击中给对方带来不可忍受的损失，那么，发动首先核进攻就没有明显的便宜，由此实现战略稳定性<sup>10</sup>。这个思想一直主宰美苏（俄）之间的战略武器谈判。根据战略稳定的概念，在美苏的核军备控制与核裁军中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规范：部署陆基多弹头、部署战术武器、增加核武器精度、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等都不利于战略稳定。目前，战略稳定性理论仍然是重要的军备控制思想，美国正在考虑中的一些新的军备控制措施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比如，降低核武器的戒备状态，增加核武器发射准备时间等。但是，美国一些保守势力，例如，上一节讨论的第一篇报告把战略稳定性理论，尤其是相互确保摧毁理论归结为冷战思想。他们希望能够放弃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进而为美国发展全国导弹防御扫清障碍。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美国保守势力批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但美国未必能完全放弃这种理论，更不能完全放弃战略稳定性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已经深深植根于已有的军备控制实践，而美国大大获益于这些军备控制实践。

除了战略稳定性的理论，军备控制中还有其他一些思想和理论。在冷战结束前后，影响迅速扩大的主要思想有“绿色关切”、经济考虑和防扩散考虑。“绿色”关切主要是从人道主义、环境保护等绿色思路出发，推动军备控制的发展。

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军备控制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禁止反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地雷公约》<sup>11</sup>以及其他的禁止地雷的倡议和谈判。地雷是典型的被动防御的常规武器，部署地雷会增加进攻一方的成本和难度，单纯从危机稳定性的角度来看，部署地雷并没有问题。但是，该公约认为，反人员地雷每周杀死或者致残数百人，其中主要的是无辜的和没有防卫能力的平民，甚至是儿童，这种情况还阻止了经济的发展与重建以及难民的回归故里。可以看出，战略稳定性，甚至国际安全都不是这个条约的基本出发点，该条约的基本出发点是人道主义考虑。这种人道主义考虑可能尚未完全体现在军备控制条约里，但是已经体现在很多军备控制的研究和讨论中。有的问题可以分别从战略稳定性和人道主义两个角度来看待，例如发展具有穿甲和钻地能力的武器的问题。一方面，发展穿甲和钻地能力有利于攻击对方加固的军事指挥控制系统，因此，有可能降低战略稳定性；另一方面，用于增强穿甲效果的贫铀在穿甲过程中汽化，形成有很大化学毒性的物质，因此，对环境和人员有强烈的污染作用<sup>12</sup>。上述第二点就是一种绿色考虑。现在，这种“绿色”关切正在形成推动军备控制发展的重要思路。

经济考虑一直是军备控制中的考虑之一。但是，只有各国的安全感有所增加，经济考虑才能成为军备控制中的一种重要考虑。中国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军队员额裁减一百万的庞大裁军行动，其出发点就是“把经济搞上去”。当时能够作出这个决定，最根本的一个转变是，国家领导人改变了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sup>13</sup>。因此，经济考虑是这次大幅度裁军的一个主要考虑，而中国的安全感增加则是这次裁军决定能够得以通过的一个首要条件。中国单方面的百万裁军行动对缓和当时国际紧张气氛有着非常积极意义，例如，中俄边境裁军就得益于中国的这次裁军行动。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主的政策在此之后取得了瞩目的成效，经济考虑在世界各国的军备控制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冷战结束前后，以降低军费为目的的军备控制开始成为全球军备控制中的重要内容<sup>14</sup>。即使像美国这样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也不得不把经济因素作为军备控制中的重要考虑，例如，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是否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的四个基本判据之一就是费用。基于经济考虑的军备控制往往是单边的行动，不一定会形成条约。因此，人们可能会忽略这样的因素。

现在国际军备控制阵营已经分裂。西方国家中保守的阵营现在只关心直接的不扩散(non-proliferation)和反击扩散(counter-proliferation)。不扩散是指通过国际合作防止武器技术的转让和作出国际承诺不发展某些武器。这方面的努力同时也能够得到激进和平团体的支持。因此，西方国家每每在不扩散问题上取得一致并有重大动作。例如，推动《核不扩散条约》的无限期延长，强化《导弹技术控制体制》。反击扩散是指：第一，采用政治、经济手段制约武器扩散行为，例如对印度、巴基斯坦核试验的制裁；第二，采用军事手段打击扩散行为，例如轰炸伊拉克的武器生产设施；第三，企图通过发展自己的武器抵消武器扩散的作用，例如发展战区导弹防御。在这方面，保守阵营和激进阵营往往意见不一，甚至对立严重。因此，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行动摇摆很大。不结盟国家对军备控制的态度也已经严重分裂，在军备控制中已经不能形成一致的立场，其作用已经明显下降。能够形成一致的立场也主要在不扩散问题上。因此，未来军备控制中不扩散的成分还将继续增大。

#### 4、没有条约的军控？

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的国力有大幅度的削弱。美国事实上已经不把俄罗斯看成平等的军备控制对手，与俄罗斯进行双边对等军备控制的兴趣已经明显减弱。考虑到俄罗斯会因为武器老化而导致核武器的总战斗力大幅度下降，美国的保守和自由派都建议进行单方面的核裁军。美国发展全国导弹防御已经使得俄罗斯感到威胁。俄罗斯杜马已经规定，一旦美国破坏《反弹道导弹条约》部署全国导弹防御，俄罗斯将退出《进一步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意味着美俄双边基于条约的军备控制将进入一个死胡同。

多边的基于条约的军备控制目前也已经处于困难之中。美国参议院拒绝了多边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生效难见希望；美国虽然批准了《化学武器公约》，但却对其实施设置了一些障碍；《生物武器公约》核查的谈判未见进展；多边军控场所日内瓦裁军会议已经多年没有进行实质性谈判。美国态度的转变是多边军备控制出现难局的重要原因。在多边的军备控制谈判中，美国只能占有一席之地。在其强权地位有所增强的情况下，美国显然是不满意这种局面的。为此，美国对多边军备控制的热情变得明显不如从前。美国国内政治的掣肘，也使得美国在多边军控中难以有所作为。美国今后热衷的是以美国为首、以卫星国为辅建立类似《导弹技术控制体制》的多边的非正式体制，或者建立一些双边的协商机制。与正式的多边条约相比，这种非正式的多边体制有以下特点。第一，在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有可能更多体现美国意志。美国在其国内法及其实践的基础上，与其卫星国经过磋商达成一个相互约定，以美国的国内法律作为范本，形成共同遵守相互协调的机制。第二，更适应美国国内政治特点。由于有美国国内法律及其实践作为基础，以及体制不是正式国际条约，美国国内政治的阻力会小一些。第三，实施过程中便于美国使用多重标准。这样的体制没有类似《化学武器公约》的组织那样的国际机构负责实施，因此，使得美国有可能有选择地进行实施。第四，便于美国有重点地扩展成员。在多边军备控制条约谈判中，很多没有违约技术条件的国家也拥有发言权，在谈判中会提出一些令美国难堪的要求。在非正式的体制中，美国可以撇开这些国家，逐个诱逼重点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参加。显然这样的体制更能体现美国的意志。因此，美国将兴趣会更多地转移到建立一些非正式的体制中来。由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突出地位，美国的政策改变必然会使得多边军控的重点向非条约的机制转移。

美国的保守实力热衷双边的协商机制，是希望既不束缚美国的军备控制发展，又能对俄罗斯的军备发展动态有所了解和牵制。已经有美国学者和前官员对非条约的双边军备控制方式提出了具体的建议<sup>15</sup>。这些建议包括：解除部分战略武器的运行状态、单方面提供预警数据、将战术核武器入库、合作性的降低核危险活动等。这些建议明显是为了限制来自俄罗斯的事故性的核进攻，但本身不带有条约的限制。美国由于奉行单边主义而疏离基于条约的军备控制，对此，美国的学者有很严厉的批评<sup>16</sup>，这些批评对于阻止美国走到反军备控制的极端有一定意义。

可以看到，美国的现行军备政策削弱了以条约为基础的军备控制；侵害了业已形成的一些军备控制的规范和实践；美国发展全国导弹防御会使得军备控制的基础变得更加不稳定。但是，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基于国内的原因，并不愿意奉陪美国搞军备竞赛；美国也不愿意看到对其安全有利的国际军备控制体制完全崩溃；美国的全国导弹防御系统在技术上的无能以后将会更明显地表现出来<sup>17</sup>。因此，现有的军备控制格局可能会在一种不稳定的态势中得到大体的维持。大体维持是指：多数的军备控制的内容将在没有条约保障的情况下保留下来。例如，尽管《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不大可能近期生效，但是，主要核武器国家也不大可能恢复核试验。不稳定主要体现在各个国家对军备控制的信心将下降，相互的猜疑和指责将增多。

除此之外，未来军备控制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以条约为基础的军备控制的成分将下降，这意味着军备控制核查、有组织的条约实施等以条约为基础的活动将减少。但是，单方面的军备控制仍将发展，相互关联的非条约军备控制体制也会继续发展。建立军备控制的信心将更多地依靠自愿的透明措施。

军备控制的思想将比过去更为丰富，除了战略稳定性理论，其他一些诸如绿色关切、经济考虑、不扩散思路等将更多地体现在军备控制中。绿色关切和经济考虑超出了传统的安全考虑，是新的非传统安全观的一种体现。在这些领域，非政府组织可能比过去有更多的作为。

注解：

---

<sup>1</sup> Amy F. Woolf, "98-496: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Demarcation and Succession Agreements: Background and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April 27, 2000.

<sup>2</sup> Lisbeth et al., "Highly Capable Theatre Missile Defenses and the ABM Treaty," Arms Control Today, April, 1994.

<sup>3</sup> Fred Weir, "Russia Ratifies Treaty As New Arms Race Looms",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Pg. 1, April 14, 2000.

<sup>4</sup> Walter Pincus, "U.S. Considers Shift In Nuclear Targets, Defenses to Focus on China, Experts Say,"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2001, Pg. 23.

<sup>5</sup> 杰里尔·A·罗赛蒂著，周启朋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242-265页。

<sup>6</sup> Keith B. Payne et al., "Rationale and Requirements for U.S. Nuclear Forces and Arms Control," Vol. I, Executive Report,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January 2001.

<sup>7</sup> Bruce G. Blair, et al., "Toward True Security, A US Nuclear Posture for the Next Decade,"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June 2001.

<sup>8</sup> "Public Attitudes on Nuclear Weapons--An Opportunity for Leadership,"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1998.

<sup>9</sup> Leon Sloss, "The Strategist's Perspective," in Ashton B. Carter et al. E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84. P.28.

<sup>10</sup> 同上。

<sup>11</sup> "The Ottawa Landmine Treaty, Analysis and Text," Arms Control Today, pp11-18.

<sup>12</sup> Steve Fetter and Frank N. von Hippel, "The Hazard Posed by Depleted Uranium Munitions," Science & Global Security, Volume 8, No. 2. Pp.125-161.

<sup>13</sup>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邓小平文选》，人民出

---

版社，1993年。126-129页

<sup>14</sup> Chapter IV, "Economic aspects of disarmament" in The United Nations Disarmament Yearbook, Vol. 15: 1990. Department for Disarmament Affairs, New York, 1991. Pp. 85-94.

<sup>15</sup> Lewis A. Dunn and Victor Alessi, "Arms Control by Other Means," Survival, Vol.42, No.4, Winner 2000-01, pp. 129-40.

<sup>16</sup> Jack Mendelsohn, "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und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Lawyers Alliance for World Security, March 2001.

<sup>17</sup> Andrew M. Sessler et al., "Countermeasures -- A Technical Evaluation of the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the Planned US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System,"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and MIT Security Studies Program, April 2000.